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年第 1 期 (总第 234 期)
鲁迅研究

鲁迅文学翻译思想及其翻译策略的价值与启示

王家平

摘 要: 本文从翻译者、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方法、翻译途径、译本读者、翻译批评以及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等层面入手,对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呈现了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整体面貌和独创精神,并就鲁迅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直译方法的价值和启示作了简论。

关键词: 鲁迅;翻译思想;异化策略;直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 I210.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142(2017)01-0131-11

鲁迅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分别有 300 多万字[①],它们构成鲁迅文学事业的两翼。学术界对鲁迅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②];相比之下,鲁迅文学翻译的研究未能得到充分重视[③]。在为数不多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成果中,关注的重心落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鲁迅所译《域外小说集》、《死魂灵》、《小约翰》等重点篇什的分析和阐述,而缺乏对鲁迅 30 部文学译作集和 80 篇散篇译作的全面、系统的研究[④];二是对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研究。不过,已有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研

收稿日期:2016-10-30

作者简介:王家平,男,浙江庆元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北京 10008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绘现代文学版图——鲁迅翻译文学研究"(09BZW048)的阶段性成果。

① 2005 年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8 卷)含鲁迅文学创作、学术著述、日记等 350 多万字,相关的注释和索引 350 多万字;2008 年版《鲁迅译文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8 卷)含鲁迅文学翻译作品 330 多万字。

② 通过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检索,该馆以"鲁迅研究"为主题的藏书有 5000 部;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以"鲁迅"为主题的学术文献有 56149 篇,以"鲁迅"为主题的硕士博士论文 1545 篇。

③ 通过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系统检索,该馆藏有鲁迅翻译研究的书籍为 9 部;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以"鲁迅翻译文学"为主题的学术文献有 389 篇,以"鲁迅翻译文学"为主题的硕士博士论文 152 篇(其中专门以鲁迅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 4 篇)。

④ 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绘现代文学版图——鲁迅翻译文学研究"成果《阐释与对话:鲁迅翻译文学文本研究》(未出版的专著),对鲁迅全部 30 部译作集和 80 篇散篇译作进行了逐篇的细读和分析。

究成果主要的关注点是鲁迅的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等三四个翻译基本理论问题，而忽视了对其他翻译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文意欲对鲁迅文学翻译思想作整体的研究，以期拓展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研究疆域。

翻译是语言文化信息传播、转化的过程，翻译行为包含的要素有：原著（信息源）——原著出版、发表（信息传播）——译者（信息传递者）——译著出版（信息的再传播）——读者（信息接受者）——评论者（信息的评估者）等。要探讨某位文学翻译家的翻译思想，至少应该从以下层面入手来开展研究：翻译者（谁译）——翻译目的（为什么译）——翻译选材（译什么）——翻译策略方法（怎么译）——翻译途径（转译、复译）——翻译读者（为谁译）——翻译批评（译得怎样）——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等。

本文就按照上述所划分的几个层面，逐项阐述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在此基础上，再简述鲁迅文学翻译的价值和启示。

一、普罗米修斯：现代理想译者的原型

先来看古人是怎么评价翻译人员的，然后再看鲁迅对译者的独特认识。先秦时代把翻译人员称作象胥，俗称舌人，后来称翻译人员为通事。在那些时代从事翻译行当的人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唐代刘禹锡的诗作中就写道："勿为翻译徒，不为文雅雄。"（《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从明朝起翻译人员甚至被视作汉奸，16 世纪前期，有位帮助葡萄牙使团担任翻译、叫做火者亚三的中国人就被官府称作"汉奸通事"①。鸦片战争期间，在外方与中方之间充当翻译的人也被国人视作汉奸。其实与其他行业从业人员一样，翻译人员也不能说都是品性恶劣之徒，谁也不能否认唐代杰出翻译家玄奘对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但是的确也有挟洋人自重、甚至通敌的翻译，而更多的翻译人员都只是普通人而已。

鲁迅曾对古代翻译人员的特殊地位做过考察："我记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时，裁判就用翻译。一个和尚去告状追债，而债户商同通事，将他的状子改成自愿焚身了。官说道好；于是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②出现这种翻译勾结商人害人的局面，真是太可怕了，好在像这样草芥人命的翻译毕竟少见。鲁迅还勾画了包括一些较为恶劣的翻译人员在内的洋行从业者的"西崽相"："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③这是典型的挟洋自重的行为，是缺乏民族主体性的社会频频出现的恶俗。

鲁迅也批评了一些译者光挂招牌而不肯动手翻译的争抢地盘作风；与此同时，鲁迅说也有不为译界时髦所动，踏踏实实埋头译书的人，他为此称赞了致力于翻译俄苏文学的曹靖华，说他一声不响地做事，"后来却成为中坚"④。深受鲁迅器重的未名社成员韦素园也是这样一位埋头译事、在 30 岁就去世的译界才俊。鲁迅欣赏过的韦丛芜、李霁野、徐梵澄等都是曾经踏踏实实地埋头于译事的翻译工作者。

在鲁迅心目中，真正有理想的译者应该具备玄奘那样的献身精神。鲁迅曾对自身作为译者的身份有过描述和界定："人往往以神话中的 Prometheus 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⑤

据古希腊神话说，天神普罗米修斯与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宙斯禁止人类用火，普罗米修斯帮人类偷得天火，触犯了宙斯的禁令而被绑在高加索山上忍受被鹰啄食心脏的苦刑。鲁迅没有直接把译者比拟成普罗米修斯，只是说自己从事翻译如同从外国窃得火来煮食自己的肉，这种决心自食的译者姿态，与普罗米修斯的为人类受难异

①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8 页。
② 鲁迅：《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448 页。
③ 鲁迅：《题未定草（一至三）》，《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66 页。
④ 鲁迅：《曹靖华译 < 苏联作家七人集 > 序》，《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572 页。
⑤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213 - 214 页。

曲而同工。鲁迅塑造了一个受难型的译者原型形象，普罗米修斯成为现代理想的译者原型。

二、译介目的：移情，益智，输入新的表现方法

鲁迅很少从整体上谈论翻译的目的，他更多地在具体译作的前言和后记中谈他译介该译作的具体目的。在他的重要翻译论文《关于翻译的通信》里，鲁迅谈到了理想的译作“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对于输入什么样的新内容，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没有作具体解释，他主要谈到了怎样输入新的表现法问题：“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①

后来，鲁迅在《题未定草（一至三）》中指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②鲁迅翻译目的论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大体可以归为“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即一要改变读者的性情，二要有利于提高读者智力水平，这就是鲁迅启蒙主义的翻译目的论思想，与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体系建立起了相关的关系。

鲁迅曾经谈到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学创作思想，“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鲁迅的翻译目的与此基本相同，即通过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学来启发民智，帮助民众摆脱彼此冷漠的态度，建立起同情同感的现代性感情互动方式。

三、译本取材：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偏重

鲁迅的启蒙主义翻译目的论也可以归结为“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因此他的翻译取材与他创作上的取材基本一致，即“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开始翻译实践，他当时“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④。鲁迅看重的是这些弱小民族文学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思想表达，这与清末中国青年希求民族强大的心声产生了共鸣；鲁迅也看重弱小民族文学表现民众生活疾苦和民众奴性心理的思想表达，这与他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了对话。

鲁迅在《＜竖琴＞前记》中说：“我向来是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透露的是他译介东欧等弱小民族文学的兴趣。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还谈了他翻译取材的另一个重心，即对俄罗斯文学的偏重及其原因，他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⑤鲁迅以及周作人、茅盾等翻译家大力倡导和实践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模式。鲁迅文学翻译取材的另外两个重心是苏联

①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1页。
② 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6卷，第364页。
③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④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5页。
⑤ 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443页。

文学和日本文学。

鲁迅曾经在1929年明确表明自己翻译选材上的立场，“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①。鲁迅这种翻译选材立场真可谓是戛戛独造，因为诸多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都有通过译介世界不朽名著而使自己名垂译史的雄心，胡适就曾经公开亮出自己的翻译选材立场是：“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②胡适的选择没有错，鲁迅的选择更难能可贵。鲁迅的这种译介立场除了跟他在哲学上告别不朽而期待速朽的中间物思想有关外，更与他通过译介弱小民族文学在世界上为同是弱者的中国寻找盟友的翻译思想有关。

鲁迅的这种偏向于弱小民族文学的选材立场招来不少误解和批评。梁实秋对这样的翻译选材表示怀疑：“不但那外国作者的姓名我们不大熟悉，即其国籍我们也不常听说。”③林语堂甚至攻击鲁迅开创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模式是媚俗行为：“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④

鲁迅对林语堂的讽刺作了回应，他回顾了中国翻译界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历程：“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然后，鲁迅反驳了翻译弱小民族文学根本不是献媚，相反倒是因为这些译者超越了文学势利主义的表现：“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⑤

上述观点显示了鲁迅卓尔不群的翻译立场，在中国仍然饱受列强欺凌的时代，他不想加入译介英美法德文学的行列，因为这些“强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巨大，而且有不少带西崽相的势利眼买办文人跻身于译介列强文学的行列。鲁迅选择的是那些没有加入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甚至当时仍然还是弱小民族的文学来译介，以寻找民族自强、反抗列强的精神盟友。

在鲁迅翻译取材上，学者梁玉文注意到还有一个独特性，即鲁迅特别关注那些“贫病、流亡、遭迫害、英年早逝、精神孤寂或思想苦楚等”方面的作家，如爱罗先珂、巴罗哈、苏联“同路人”作家等⑥，这同样显示了鲁迅对世界文学家群体里的弱小者的关切。

四、异化策略和直译方法

在独特的翻译目的和选材立场的制约下，鲁迅在译介事业中主要采取了异化策略和直译方法；但是青年鲁迅在清末刚进入译界时也追随过归化翻译潮流。清末中国译坛盟主严复倡导“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但是他本人的多半译著过于追求“达”、“雅”而未能坚持“信”的原则；而

① 鲁迅：《＜壁下译丛＞小引》，《鲁迅全集》第10卷，第307页。
②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③ 黎造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④ 林语堂：《今文八弊（中）》，《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第28期。
⑤ 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6卷，第368页。
⑥ 梁玉文：《鲁迅翻译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且当时翻译文学界盛行的是对原著大为删改以适应中国读者口味的林纾翻译小说，因此归化翻译是那个时代的翻译主流。在留日早期，鲁迅深受林译小说等清末翻译时尚的影响，在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作品时对原著多有删易改动。到了留日后期，鲁迅对清末归化翻译风尚产生了不满而开始求变，他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就是向着直译的异化翻译转型的开端，他30年代跟日本弟子增田涉回顾了留日后期自己翻译上的转型，他说："我和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了起来。"①

鲁迅在翻译上的异化追求、直译方法使得他的译著显示出了明显的欧化倾向，因此招来批评。老派文人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说："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比于时装妇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国，独非奴性耶。"②鲁迅后来撰文回应了人们对欧化的嘲笑："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③

正如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归化翻译基本上都是译介主流一样，中国现代译坛认可归化翻译的思想也颇有势力，翻译家赵景深30年代初就撰文说："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④

鲁迅把赵景深的观点总结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鲁迅反对赵景深这种过于追求顺畅的归化翻译主张，认为"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⑤。赵景深倡导顺畅翻译没有错，但是他把"译得错不错"的标准放到"译得顺不顺"的标准后面，就有"宁顺而不信"的过分强调顺畅翻译的倾向。鲁迅认为翻译中信是第一重要的，但是他多少还是把信、顺问题对立起来，甚至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主张。不过应该看到，鲁迅提出这个主张是有条件的，即这种"宁信不顺"的译著读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鲁迅在与瞿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信中把翻译读者划分为3类，即受过良好的教育的、略微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鲁迅说对于第一类读者，他是主张提供"宁信和不顺"的译著的，他解释说："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⑥

鲁迅当然明白中国化（归化）倾向的译本更容易博得读者的欢心，那么他为什么不主张给读者提供更加中国化的顺畅译本呢？鲁迅对此回应说，不顺而信的译本也是译本，他力图推荐给读者的这种译本应该是这样的："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具体解释道："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

① 鲁迅：《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4卷，第196页。
② 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27－428页。
③ 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上）》，《鲁迅全集》第5卷，第548页。
④ 赵景深：《论翻译》，1931年3月《读书月刊》第1卷第6期。
⑤ 鲁迅：《几条"顺"的翻译》，《鲁迅全集》第4卷，第350－352页。
⑥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1页。

有。”[①]因此鲁迅提倡以信为主的异化翻译是有着其良苦用心的，即通过直译异域文学作品不仅给中国输入新思想和新的感情，更要输入外国语文（主要是欧洲语文）精细严密的语法，以建构新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应该说，鲁迅这种异化翻译策略和他翻译实践中以信为主的直译追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语言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遗憾的是不仅中国过去的知识界不重视鲁迅的这些有益探索，而且当代中国知识界也没多少人去仔细体会鲁迅当年的良苦用心。

鲁迅的直译追求在当时遭到梁实秋等人的嘲笑，梁实秋说读鲁迅有些译著“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他把这样的翻译称作“硬译”[②]。其实翻译界本无“硬译”这种翻译方法，它只能算是翻译中的一种坚持到底的韧性精神。学者梁玉文指出：“硬译本来体现的是鲁迅克服困难进行翻译的坚持精神，在翻译论争中才演变成翻译方法。翻译论争使鲁迅在理论上更加坚持硬译，但是在翻译实践中这种坚持使鲁迅身心都遭受了创伤。”梁玉文考察了鲁迅的翻译实践后指出：“其译文基本属于直译的范畴，儿童文学和戏剧等甚至可以追求意译，只有文艺理论中存在难懂甚至根本无法理解的句段——就是那些被冠之以‘硬译’的部分。”[③]

其实，鲁迅在与梁实秋翻译论争之外的文章里并未死守“硬译”立场。他在《题未定草（一至三）》中说起了自己正在翻译的《死魂灵》，他批评了该书的日译者上田进过度追求顺畅易懂的归化译法：“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④]鲁迅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可见在首先强调信的前提下，他是坚持信、顺兼顾的翻译方法的。

在翻译实践中，鲁迅对翻译方法的选择比较灵活，比如在翻译《小约翰》这样以少儿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童话作品时，他坚持以直译（信）为主，同时在人名、小精灵的名字翻译等方面又采取了意译方法。1929 年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陈君涵给鲁迅寄去剧本译稿，鲁迅在回信中对译稿提出了看法：“不过觉得直译之处太多，因为剧本对话，究以流利为是。”[⑤]剧本是准备共舞台演出的本子，对话如果过于冗长或者别扭，就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演出效果，因此应该尽量保持流畅通顺。

五、特殊的翻译途径：转译和复译

鲁迅对转译、复译等特殊的翻译途径多有阐述。直接从原著进行的翻译活动称作直接翻译，借助别的翻译译本进行的翻译活动称作间接翻译，又称转译。从理想的角度说，一切翻译最好都直接从源语出发来翻译为好；但是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现实中的不少翻译是在别的译本基础上进行的。鲁迅在《题未定草（一至三）》里回顾了清末以来中国人学习当时世界上 3 大语言——英、法、德语的情况，他以学习人数最多的英语为例，清末翻译英语名著的竟主要依靠不懂英文的林纾，20 年代则是靠懂日语的田汉翻译莎士比亚。英语名著的直接翻译都如此少见，东欧、北欧、南欧等弱小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翻译就不能不靠其他译本转译了。

鲁迅的《论重译》是一篇专论重译（即转译）的文章，文章从穆木天关于间接翻译（重译）是滑头办法说起，鲁迅承认重译（转译）确实比直接译

①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391 页。
② 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新月》月刊，1929 年 9 月第 6、7 号合刊。
③ 梁玉文：《鲁迅翻译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45 页、第 149 页。
④ 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64 －365 页。
⑤ 鲁迅：《1929 年 6 月 21 日致陈君涵》，《鲁迅全集》第 12 卷，第 187 页。

容易，他分析了重译比较容易的原因说："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鲁迅也赞同由懂源语的人直接翻译文学作品为好，但是他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主张，他说："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鲁迅认为"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①。

不久之后鲁迅发表了《再论重译》，他在文中提出了重译（转译）的好处是，"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鲁迅在该文中还指出，穆木天主张译者要清楚自己的译本能否成为"一劳永逸"的译本，否则还是不动手翻译为好。鲁迅不认同这种主张："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②这段文字体现了鲁迅翻译译本上的"中间物"意识，鲁迅不认为史上存在着完美的译本，任何好译本都只是名著翻译史上的一个环节。翻译史业已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荷马史诗》《圣经》、莎士比亚戏剧等经典的译本也会"老化"，也需要不断有新的译本来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基于翻译译本的"中间物"意识，鲁迅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的译著能够名垂青史，相反他不断提醒读者，说自己的译本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译品，他期待着更好的译本取代自己的译本。鲁迅在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中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译著存在着并非有意的曲译、硬译，他期待着"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③。

在具体翻译实践中，鲁迅其实常常对重译（转译）流露不满。他在译完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后表示："我很不满于自己这回的重译，只因别无译本，所以姑且在空地里称雄。倘有人从原文译起来，一定会好得远远，那时我就欣然消灭。这并非客气话，是真心希望着的。"④他在写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毁灭》我有英德日三种译本，有几处竟三种译本都不同。这事情使我很气馁。"他还说，"从别国文重译，是很不可靠的"⑤。

同样是基于翻译的"中间物"意识，鲁迅撰文主张复译，他幽默地用婚姻来比拟翻译，他调侃了那些反对复译的人："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夫之妇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⑥接着鲁迅指出，当时译坛确实出现了胡译、乱译现象，要击退胡译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鲁迅说，即使已有了好的译本，仍可以有复译："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

① 鲁迅：《论重译》，《鲁迅全集》第5卷，第531－532页。
② 鲁迅：《再论重译》，《鲁迅全集》第5卷，第534页。
③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15页。
④ 鲁迅：《<俄罗斯童话>小引》，《鲁迅全集》第10卷，第442页。
⑤ 鲁迅：《1931年10月27日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2卷，第278页。
⑥ 鲁迅：《非有复译不可》，《鲁迅全集》第6卷，第284页。

七八次的作品。”①

六、开辟多方位的译本读者交流渠道

作为翻译家，鲁迅非常重视与读者进行交流，有着较为独特的翻译读者观。1924 年 1 月初，广东新会小学教师、读者吕蓬尊给鲁迅写信，请教鲁迅所译爱罗先珂童话《狭的笼》3 个译文文字理解上的问题，鲁迅非常认真细致地给予解答，并把该信刊登在《学生杂志》上。② 1925 年 1 月初，安徽无为中学教师王铸给鲁迅写信，探讨鲁迅所译《苦闷的象征》的一些问题，并认为鲁迅译本部分内容与更早一些发表过的明权译本“所译的一毫不差”。鲁迅很平和地给王铸回信，回应后者关于《苦闷的象征》的提问，并告诉后者，他在翻译《苦闷的象征》时知道已经有丰子恺、樊仲云的全部和部分译本，但明权的部分译本是收到王铸的信才知道的。面对近似“抄袭”明权译本的指责，鲁迅能够这么心平气和地给予回应，显示了博大的胸怀和对自己译本读者的尊重。

鲁迅为自己的多数译著撰写前言后记，这些翻译副文本可以看作是鲁迅与读者交流的基本途径，他在这些翻译副文本里常常跟读者分享翻译的甘苦，分析译本的思想、人物和艺术，介绍自己翻译的文本依据、具体方法和难解之处。鲁迅在译完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写的前言里跟读者交心道：“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③

为自己的译著撰写广告词，也是鲁迅与读者交流的一种方式。从 1909 年为所译《域外小说集》写广告到 1935 年给所译高尔基《俄罗斯的童话》版权页提供广告，鲁迅为自己刊行的译本写了不少于 10 篇的推销文字。1925 年 3 月由未名社出版的译著《苦闷的象征》封底上有鲁迅为《未名丛刊》写的广告词，他说他们这些译者、编者“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④ 把话说得这么直白而且真诚，应该会受到一些读者喜欢的。

七、大力提升翻译批评的地位

对于翻译批评，鲁迅的见解也相当独特。《关于翻译（下）》包含了鲁迅关于翻译批评的丰富思想，文章指出，翻译批评任务有 3 项，即“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接着，鲁迅用俏皮的语言来展示求全责备式的批评之不合理性，他说：“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随后，鲁迅用剜烂苹果来比拟翻译批评工作。原先的求全式批评者面对烂苹果，会把它抛弃；鲁迅认为宽容的翻译批评面对“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鲁迅在文章最后呼吁：“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⑤

在《再论重译》里，鲁迅指出开展翻译批评比创作批评更艰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鲁迅说

① 鲁迅：《非有复译不可》，《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284 - 285 页。
② 鲁迅：《答广东新会吕蓬尊君》，《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155 - 156 页。
③ 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鲁迅全集》第 10 卷，第 300 页。
④ 鲁迅：《<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一）》，《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468 页。
⑤ 鲁迅：《关于翻译（下）》，《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316 - 317 页。

翻译中常参考各种译本的重译(转译)本,“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鲁迅说,翻译批评不宜太苛刻,否则会给翻译事业带来消极影响,他说:“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①

八、创作与翻译并重的文学定位

另外,在翻译与创作关系上,鲁迅的见解是值得深思的。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指出,20年代前期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期待天才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在消灭着天才,他以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关系被扭曲而不利于天才的成长为例来阐述这个问题。鲁迅说中国存在着尊崇原创作品而贬低译著的“崇拜创作”倾向,他是针对当时郭沫若的“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的观点而发的。鲁迅认为,把创作比作处子而把翻译比作媒婆,“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②。

1928年1月31日,一封署名“陈绍宋”,地址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明信片寄到了鲁迅手中,鲁迅转述说,那人“说我还是去创作好,不该滥译日本书”。鲁迅想起了几年前的事:“从前创造社所区分的‘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之说,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后来他们居然也兼做了——,倘不过是一个媒婆,更无须硬称处女。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③的确是这样,就是那位把翻译贬为媒婆的郭沫若,自己也翻译了不少作品。创作与翻译并重,完全可能造成著与译两翼齐飞的双赢局面,真的不能太贬低翻译。

鲁迅在“国货年”的1933年撰文主张翻译与创作并重,他说:“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④的确是这样的,就如同译著有好有差一样,创作的作品也未必都是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也有平庸之作,真的没有必要在创作与翻译之间划出鸿沟来的。

但是对于自己的著译情况,鲁迅有时也不自觉地流露了创作第一、译作第二的想法,他在《鲁迅自传》结尾总结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情况后说:“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⑤他在为英文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写的《自传》结尾说:“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⑥1936年,鲁迅拟编辑自己的30年来的著述总集《三十年集》,从他拟定的篇目来看,该总集收录了他的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以及学术著作,没有列入任何翻译集子。⑦ 从这一系列情况来看,非常重视翻译的鲁迅偶尔还是有创作比翻译重要的思想。这就与鲁迅理论上倡导著、译并重的思想形成了矛盾。

九、鲁迅文学翻译的内在矛盾

在鲁迅翻译文学版图上,还存在着其他内在矛盾。从整体上说,鲁迅在创作与翻译关系上冲破了前者为主后者为从的主/从二元思维误区,强调翻译与创作的同等地位;但是他的翻译思想具有鲜明的偏重原著的倾向,他在异化翻译策略的引导下,执着地运用直译方法从事翻译,显示出他具有“原著中心”的文化立场,这无形中还是置译

① 鲁迅:《再论重译》,《鲁迅全集》第5卷,第534 -535页。
②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75 - 176页。
③ 鲁迅:《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鲁迅全集》第8卷,第309 -310页。
④ 鲁迅:《关于翻译》,《鲁迅全集》第4卷,第5686页。
⑤ 鲁迅:《鲁迅自传》,《鲁迅全集》第8卷,第343页。
⑥ 鲁迅:《自传》,《鲁迅全集》第8卷,第402页。
⑦ 鲁迅:《“三十年集”编目二种》,《鲁迅全集》第8卷,第519 - 520页。

作于次要地位。

鲁迅非常执着地运用直译甚至硬译方法，试图再现外国原著的丰姿、情调和思想方式，尤其是试图通过再现外国文学原著的语法结构以改造汉语的语法结构。但是问题在于，他翻译的俄苏文学、弱小民族文学和其他欧洲文学（德语文学除外），大都是通过日语转译的，作为东亚语言的日语与欧洲语言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鲁迅翻译欧洲文学作品（德语文学除外），他并非是在直译欧洲文学作品，其实他是转译日语的欧洲文学译本。所以，鲁迅的直译其实是要打折扣的，他试图通过直译欧洲文学的语法结构以改造汉语的语法结构的任务因此也非常难以完成。

鲁迅不是一湾清澈的溪水，他是波涛汹涌的大江大海。作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化巨人，鲁迅不可能是单向度的精神、文化存在。鲁迅的思想、创作和翻译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正是这诸多的矛盾形成了鲁迅精神遗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和文本有着难以穷尽的阐释空间。

十、异化策略、直译方法的价值和启示

1909 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鲁迅给他们自己确定的翻译目标是“迻译亦期弗失文情”①，这是鲁迅自觉地采取异化策略和直译方法译介外国文学的肇始。到 20 年代中期，鲁迅对直译方法的运用已臻于得心应手之境，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里强调了自己翻译这部文集所用的翻译方法：“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②

到了 1933 年，鲁迅在与瞿秋白的翻译通信中解释了他不采取“完全中国化”（归化）翻译策略的原因，他说自己的异化策略、直译方法“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③。1935 年 9 月，鲁迅谈到自己正在进行的果戈理杰作《死魂灵》的翻译，他对自己近 30 年来坚持的异化策略、直译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认为文学翻译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④，他强调自己的翻译原则是以信为前提而兼顾信顺。

鲁迅的异化策略、直译方法造成其译作比较艰涩难懂而招致误解和批评。其实鲁迅这种追求有着两个重大价值：1. 他的以信为主的译著能够制造出陌生化效果，引起读者对外国作品新的词汇、语法、观念和表现手法的特别关注，为中国现代语言和文学改革寻找摹本；2. 鲁迅没有奉行使外国作品中国化的归化翻译策略，而是强调译作要保留异国情调和异域风情，这种异化翻译避免了归化翻译中常见的语言暴力，体现了对世界各民族文学（文化）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尊重。

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方面坚决批判闭关自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经由自己 33 年的漫长翻译实践，向后进的中国社会引入外国新的观念、思维、美学，以及新的语法和写作艺术；一方面他又同崇仰列强文化权力的全盘西化思想保持距离，努力在弱小民族中寻找精神的盟友，致力于译介弱小民族的文学，并与强势的西方主流文学形成抵抗式的对话关系。

鲁迅特别欣赏中国汉唐时代开放的胸襟和勇于吸收异域文化的姿态：“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接着鲁迅分析了汉唐开放立场和后来中国历朝走向保守主义背后的文化心理：“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

①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 10 卷，第 168 页。
② 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全集》第 10 卷，第 271 页。
③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391 页。
④ 鲁迅：《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64 －365 页。

和孱奴的宝贝。”①

追慕汉唐文化开放传统的鲁迅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进路：“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②鲁迅在30年代进一步地把这种文化开放思想提炼为“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具体的内涵是：“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③

鲁迅张开双臂拥抱世界上各种文化遗产的同时又具有卓绝的文化自信力，他广泛吸纳异域文艺的同时坚持拿来主义文化选择立场，他那种与文化势利眼形成强烈对照的不媚列强而亲近弱小国家之独立不依的姿态等等精神遗产，对于当代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对于中国人在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既充分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又坚定地、自信地走自己民族独特文化之路，都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对话和冲突成为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基本态势，拒绝对话和强化各民族文化的对抗，都将会导致人类文化新的灾难；反之，不珍惜各自民族的文化，完全向主流文化（西方文化）并拢，同样会破坏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而导致世界文化的衰微。鲁迅独特的翻译路线和文化理念，显示了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独立、自尊、理性的文化立场：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对话联系，又拒绝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鲁迅的立场对于当下深化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应该具有深刻的警醒力和启示力。

（责任编辑：素　微）

① 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8－209页。
② 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210－211页。
③ 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第41页。